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07.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政,江小鹏.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06-120. Doi:10.11835/ j.issn.1008-5831.pj.2024.07.002.

Citation Format: XU Zheng, JIANG Xiaopeng.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of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Lear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6):106-120. Doi:10.11835/ j.issn.1008-5831.pj.2024.07.002.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徐 政[1],江小鹏[2]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2.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文章深入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文章首先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演进,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随后,文章阐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在政府和市场关系、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宏观调控与国家治理方面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强调了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和谐共存、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以及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我国将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法治化方式完成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升级改造。文章还进一步探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意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国家治理与发展的内在关联上讨论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价值,指出高标准市场体系下的生产关系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制度保障,上层建筑优化可对经济基础发展提供集成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为社会发展提供共建共享的动力,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算法视角下数字帝国主义掠夺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2CKS017);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价值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赋能江苏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3SYB-085)

作者简介:徐政,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Email: 807211542@qq.com;江小鹏(通信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律体系完善、人才培养创新在市场机制建设赋能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最后,在实践进路方面,文章提出一系列策略,如发挥政府治理的效用、建立健康的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化创新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以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效能互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的现代化来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落地。这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有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统一大市场;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6-0106-15

一、问题的提出

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经济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我国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是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实现强国梦想和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贯彻落实初心使命的重大体制创新。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已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然而,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构建一个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完善尤为引人瞩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基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愿景目标,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策是在深刻认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旨在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不完善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全会上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高水平阶段迈进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并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融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复合型经济体系。该体制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倡导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强调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和谐共存,同时认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辅以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对现有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提升,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一进程要求我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中国如何通过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宏观调控机制

的优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将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经济制度的合理完善,也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有效运作来实现。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体系的改革,还关联到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不仅需要理论的创新,也需要实践的探索,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

为了有效解答以上理论问题,本文将深入分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脉络、内涵特征、理论机理、实践路径。通过文献回顾和国内外经验的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挑战,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脉络和内涵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进程,它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的显著成就。下面,笔者将通过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发展及其理论内涵,经由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辉煌历史来揭示这一体制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独特路径。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是对中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深刻反思和积极改革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问题,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受阻等。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了经济体制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引入、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2]。展开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脉络可总结为摸索期到推进期、再到全面深化期这三大区间[3]。在1978—1992年的初期阶段,中国启动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转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激活经济动力。该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打破旧有思想的束缚,实现从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探索其潜在价值的观念转变,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随后的1992—2002年,标志着进入改革的深化阶段,中国开始正式吸纳资本概念,并着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框架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进入了完善调整的阶段。在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大作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改革措施,有效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对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化,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日趋完善,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这一阶段更加重视规范和引导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让资本在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4]。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体制活力与制度保障。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市场交换型经济,其最鲜明特征及动力源泉是开放性,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学说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主题,实现了从经济机制到经济体制、再到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创新。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完善是一个逐步深化和演进的进程,其中中国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探索始于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批判性反思和对市场经济机制的深入理解,逐步构建了初步的理论体系。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化,中国在实践中有效地将市场经济概念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连续性发展,旨在构建一个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能有效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在引入市场经济概念时,中国学者和决策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解读和创新。其间,我国在经济体制变革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在实践中,中国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到后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一过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完善。同时,资本利用的理论也得到了不断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本的认识和利用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交换经济作为本质属性,开放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及动力源泉,这为资本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是理论完善的关键。通过强化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确保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持续革新和深化其发展观念与改革推进策略。在强调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进入新时代,中国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注重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以构建一个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倡导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通过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国际传播和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6]。

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制度安排,其基本内涵丰富,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多个层面。这一体制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更融入了社会主义的特殊制度属性,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在这一体制框架

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元化所有制经济共存并繁荣的局面。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不仅保障了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而且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均衡发展[7]。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通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确保了不同所有制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竞争。这种平衡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一体制体现了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手段,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这种结合既保证了市场机制的效率,又发挥了政府在引导和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从而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公平正义[8]。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有效协调,确保了市场的活力和经济的有序运行。同时,该体制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将它们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通过建立支持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同时,该体制注重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努力减少城乡、收入和区域间的差距,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10]。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全面进步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借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东风得以同步实现。总体上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平衡好政治与经济、增长与收缩、秩序与活力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深化改革指明方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配置作用、政府治理、协同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建设等多个维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1)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领域流动,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也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提高生产力的基础。(2)政府扮演市场辅助和补充角色,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手段,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方向。政府需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政策引导,防止市场失灵,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政府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规,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并通过监管和执法防止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市场则通过竞争和创新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减少行政审批,优化服务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和服务,确保市场秩序的公平和透明。此外,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市场,并为不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提供有序退出途径,促进市场新陈代谢和健康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需在宏观层面进行科学决策,合理调控经济运行,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政策工具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关系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还强调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培育高水平的营商环境。一方面,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国

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主导作用。做大做强国有经济,需要通过战略性重组和调整,优化国有资本的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致力于推动国有企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发展,以此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深化国企改革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内部治理,是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措施。公有制经济还需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至关重要。在发展环境上,实行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竞争中性”原则,消除歧视政策和无形门槛,是改革的重要方向。各级政府应积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各类所有制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简而言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在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政府的科学调控,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进行。

(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制度安排,它不仅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而且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这一体制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显著的特点,包括对高水平的价值追求、高标准的发展目标、多层次的调控手段、宽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一体化的流通市场[11]。从理论基础来看,它强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套适应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政策引导,确保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在政策选择上,政府注重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整体而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这些特点,全面展现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与能力。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对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现了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科学运用。这一体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确保市场的有效运作和政府的有为干预相得益彰。这一体制还强调产权的有效激励、要素的自由流动、价格的灵活反应、竞争的公平有序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以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在政策工具方面,包括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财政金融体制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旨在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并确保市场主体在公平环境中竞争和发展。资本在这一体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资本的定位与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适当的规范和引导,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目标。同时,对资本的监管与规范至关重要,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确保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特点。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互补的格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则在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创新和满足多样化需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这当中,市场与政府的相互补充和互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同时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这种优化所有制结构的策略,不仅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还带来了经济结构的优化效应。政府在处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时,应坚持竞争中性原则,确保在市场准入、资源获取和法律保护等方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这种平等的监管环境,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条件。此外,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促进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加强产权保护尤为重要,确保公有财产和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各类所有制经济提供稳定可预期的产权环境。这不仅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也激发了他们的活力,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策安排和政策工具箱选择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要通过全面构建统一大市场来疏通壁垒、畅通交易。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构建统一大市场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一概念强调全国范围内形成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条件下参与竞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统一大市场需要依托现代产权制度,这一制度应具备清晰的归属、明确的权责、严格的保护和顺畅的流转,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地域和行业壁垒,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前提。监管部门的职责是确保所有市场主体在统一大市场中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要求各级政府积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如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限制,以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市场竞争机制能够促进企业的自主选择和淘汰,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统一大市场还意味着商品和服务可以自由流通,为创新驱动和效率改进提供广阔的空间,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市场的统一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关键经济制度安排,其主要特征在于其深厚的理论基础、明确的市场与政府功能定位、具体的实践路径以及对资本的合理监管与引导。这种体制不仅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财政金融体制以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同时,资本在这一体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适当的规范和引导,以确保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目标。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意蕴

(一)高标准市场体系下的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制度保障

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生产关系的革新构成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先决条

件。伴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持续演变及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生产力的演进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相反,其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创新、数据资源以及数字技术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呼唤着生产关系的新形式,这涵盖了所有权结构的创新、更为紧密且复杂的系统性协作机制、更高效匹配的要素市场以及趋向于共享的分配模式。这些新型的生产关系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由此,高标准市场体系下的生产关系不仅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制度保障,还通过扩大内需和科技创新驱动,促进国内外经济循环的良性互动,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2]。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触及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仅是经济进步的体现,更是社会改革的必然要求。其核心途径在于深化经济体制及科技体制的改革,及时调整所有制结构、交换机制、分配模式等关键要素,以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制度创新是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关键,亦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通过促进科技成果、社会资本、人才资本及创新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向产业部门的流动,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有效整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奠定坚实的基础。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动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涵盖了所有权结构的创新、更为紧密且复杂的系统性协作机制、更高效匹配的要素市场以及趋向于共享的分配模式。这些变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制度保障。新质生产力则代表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发展依赖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有力支撑,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调整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等,塑造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在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基础中,也在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累积物质基础。简而言之,变革生产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基础,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已成为核心议题。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与进步。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发展必须紧密结合地域特性,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挖掘和应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以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需求。具体而言,根据地域特性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应用,更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实践,符合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重构与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不仅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平台,也为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在信息网络时代,数据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技术,数字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数字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的前沿技术紧密相关,这种联系使得数字技术几乎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一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13]。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提高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提高了社会生产的协同性与共享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紧紧围绕数字技术进行赋能和变革。然而,如果劳资关系处理不当,数字技术异化可能加剧劳动者贫困程度、提高劳动者失业风险,数字平台垄断可能导致

两极分化。

可以认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护中小企业、消费者、投资者利益,通过共商共建打造利益共同体与创新共同体,这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有助于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和宏观调控手段,克服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简而言之,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通过改革经济和科技体制,调整生产关系,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提升劳动者地位和生产协同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策略。

(二)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发展提供集成效能

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要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与完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以更好适应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是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关键。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应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以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优化政府治理,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政府在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有效的治理和调控,促进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政府应从传统的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转变。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从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14]。政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市场体制建设中应发挥统筹、协调和组织作用,这要求政府明确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职责。政府治理的优化还需要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通过电子政务、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政府服务的便捷性和响应速度。与此同时,政府治理的优化还应促进社会各界的参与,增强政府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参与平台,使政府决策更加贴近民意,更好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为了确保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还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和问责机制。通过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及时发现和纠正政府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发展,这包括更为紧密复杂的系统化协作关系,这要求政治体制提供更加灵活高效的治理结构,以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需求。

其次,法律体系的完善也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新兴领域的活动,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15]。数字经济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数据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变革的关键要素,这要求法律体系对数据权利、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以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法治是现代治理体系的基础。政府治理的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上,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行为,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法律对数据确权的保护是发挥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作用的关键,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应有之义。这就需要法律体系对新兴领域进行规范和保护,以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以法治的方式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也是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的重要基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其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经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和鲜明特色。我国在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经济形式的产权保护,优化负面清单制度以科学合理地安排各行业的市场进入壁垒,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等各个经济实体的信息披露,实现合理合法的破产清算和信用监管,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土地、数据等要素市场制度和流动规制,促进要素合理化配置和充裕流动。

最后,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也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重要途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具备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以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16]。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要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与人才链之间的有效融合,这就需要教育体制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紧密结合,培养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与此同时,文化领域的改革同样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对经济基础产生深远的影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应当鼓励创新、尊重知识、倡导诚信,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综上所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调整与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不仅涉及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的完善,还包括文化领域的改革和教育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通过这些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高水平高标准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层次发展[17]。

(三)高质量宏观调控下的国家治理为社会发展提供共建格局

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质量宏观调控下国家治理可以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社会发展,这对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型产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我们将从效率配置、公平保护、科创引领、社会保障等国家治理重点领域展开分析。

首先,通过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可以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同时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其次,完善产权制度,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数据确权制度,可以起到激励创新和创业作用[18]。这样一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优化可以使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等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以公平的姿态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实现我国实体经济共享共商共建,推动经济向健康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实现不仅涉及物质层面的富足,还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维度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也需要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的合理搭配来加以保障[19]。此外,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措施,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环境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反垄断的系列国家治理措施不仅是为了防止寡头厂商市场垄断进行倾销,更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激发市场活力,这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要素市场制度的完善也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目标,也是各项国家治理措施优化配置格局、促进产业升级的应有之义。

在这当中,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通过宏观调控措施管控实体经济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国家治理和顶层设计上需要进一步深化供需匹配的结构性改革,塑造新的发展动能和优势。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培育就是国家治理的另一重点,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动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教育和人才培养对新兴产能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可以为社会发展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提供高素质人才和研发生力军。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同样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20]。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法治平台。最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的强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通过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措施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家治理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水平运行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进路

(一)发挥政府治理效用,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

在探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理分析中,我们见证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为了使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目标能落地生根,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治理的效用就在于其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与调控手段,引导和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不仅是市场的监管者,更是发展蓝图的绘制者和经济稳定的维护者。

从宏观经济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应通过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各地发展规划,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同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实现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结构的双重目标。这种治理模式体现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政府还需不断优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确保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这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强化市场监管等措施。通过这些举措,政府能更好地服务于包括国企、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多种市场主体,从而激发各类实体的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也要求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时,展现出更高的适应性和更强的灵活性[21]。这不仅涉及国内政策的调整,更强调我国政府要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范围内建设市场经济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此外,政府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转移支付分配、调节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就业环境等措施,各级政府能有效地缓解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社会向公平、协调、均衡的方向发展。

简而言之,政府治理的效用在于其对市场机制的引导、补充和完善,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通过不断优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政府能够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二)建立健康营商环境,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效能互补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营造一个健康、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对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2]。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效能互补对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23]。

国有经济作为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攻关项目研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实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应聚焦于明确企业核心业务,创新治理和考核方式,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需要全国上下各级政府持续改进服务,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及时性、便利性,完善支持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机制,引导企业响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推动企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24]。

为了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效能互补,我国政府必须致力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包容性市场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确保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竞争中性”的监管原则应体现在政府监管各类市场主体的方方面面,尤其应在市场准入、信贷审批、资格审查、能源使用等领域保障民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公平地位,消除各类非必要的歧视政策和过度的国有企业资源倾斜。此外,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创新反垄断行为监管模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证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积极性。在宏观政策层面,各级政府应致力于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发挥政策的协同作用来促进要素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这对于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样重要。通过灵活搭配政策工具,动态化、精细化调整政策,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互利共赢。

简而言之,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以及协调宏观政策,可以有效地建立健康的营商环境,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效能互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充满活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通过统一大市场统领市场机制改革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以统一大市场为统领,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推动市场机制的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一战略举措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首先,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关键。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商品、服务、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动态优化配置,形成顺畅的经济大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体制基础[25]。这要求各级政府要深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动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可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确立中性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的超时空性和低边际成本

特性来克服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26]。此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也需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基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都融合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以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作为统领。

在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同时各级监管主体要以服务型政府的姿态在产业政策、市场监督、门槛设置等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以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此外,高水平市场主体的培育、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完善、高质量营商环境的营造以及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都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还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目标。这不仅要求各级政府在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性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和加强,还要求各级政府对资本定位与功能进行深刻理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谋求资本监管和企业经营规范的实践创新[27]。

综上所述,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通过统一大市场统领市场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28]。

(四)构建现代化创新体制,以新质生产力来提振市场建设质量

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创新驱动和质能提升对于优化市场建设质量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活力,进而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利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全局需要。因地制宜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29]。

其次,数字经济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性技术,在推动数字产业作为重要载体的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落地,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创新体制的建设,数实融合在这当中将发挥重要作用[30]。

最后,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途径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及时调整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等。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与核心,这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31]。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也潜移默化地促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这就需要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及其他所有权类型的实体经济以更新模式、更为紧密复杂的形式进行系统化协作,建立起适配度更高的要素市场和共享型的分配模式,这些新型生产协作方式和价格分配格局为市场建设注入了全新的活力[32]。

总的来说,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活力,不仅能够提高市场建设的质量,还能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将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将在技术和效能的双重加持下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 (2024-07-21)[2024-07-2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2] 梁伟军,黄子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利用资本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J]. 社会主义研究,2023(6):79-85,70.
[3] 唐任伍,温馨. 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J]. 开放导报,2022(1):31-38.
[4] 周文,司婧雯. 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 上海经济研究,2022(1):27-36.
[5] 顾海良. 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与经济学说的学理创新:改革开放4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回眸[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6):4-13.
[6] 欧阳峣. 大国经济特征、优势识别与发展格局[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7):14-23.
[7] 李京京,李红亮.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重追问[J]. 经济问题,2024(1):25-32.
[8] 庞庆明.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属性研究[J]. 经济纵横,2024(6):18-25.
[9]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 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J]. 改革,2024(6):30-39.
[10] 杨静,任振宇,魏依庆.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问题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3):90-111.
[11] 唐任伍.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内涵、内容呈现和路径选择[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10.
[12] 徐政,张姣玉. 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2-80,201-202.
[13] 余澳,柯遵义. 未来产业牵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OL].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154.C.20240722.1130.004.html.
[14] 朱光磊,侯绪杰. "双线合一":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逻辑[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0-21.
[15] 王延川. 数字经济的立法模式选择与制度体系构造[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15-125.
[16] 潘柏. 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内涵、困境与对策[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75-82.
[17] 宋冬林,丁文龙. 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实现东北振兴新突破[J]. 学术交流,2023(12):105-122.
[18] 贾丽萍. 数据知识产权的权利证成与规则展开[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4):205-224.
[19] 徐政,郑霖豪.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9-52.
[20] 龙玉其. 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解析、现状反思与未来展望[J]. 理论导刊,2023(12):87-95.
[21] 魏来,李伟. "创新突围赛":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组织逻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39-51.
[22] 胡书清. 营商环境对商贸流通业服务效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2024(13):15-19.
[23] 刘万振,崔延强. 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内涵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81-294.
[24] 徐政,吴晓亮,郑霖豪. 民营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困境与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2024(4):37-46.
[25] 刘志彪.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底层逻辑与推进路径[J]. 东南学术,2024(2):64-73,246.
[26] 冉净斐,闫碧玮. 现代流通体系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机理、现实难题与优化路径[J]. 宁夏社会科学,2024(2):88-97.
[27] 何自力.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性质和作用[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11):4-11,109.
[28] 胡家勇.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逻辑和路径[J]. 南开经济研究,2023(11):37-50.
[29] 蒋永穆,冯奕佳.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现实表现与路径选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2.
[30] 李晴,刘海军,张海峰. "数实"融合:数字经济分类治理的框架、逻辑与进路[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64-175.
[31] 刘志彪. 以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 理论探索,2024(3):5-11.
[32] 尹俊,孙巾雅.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改革,2024(5):45-53.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of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Lear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XU Zheng[1], JIANG Xiaopeng[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CPC Jiangsu Committee, Nanjing 210009, P. R. China;*
2.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of the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iming at respon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alyzes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evolu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n, the paper explain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not onl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tate-owned economy and private economy, macro-control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various ownership economi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role, and the key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will legally complete the upgrading of market system and market mechanism by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promoting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factors,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system of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also further discusses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under the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can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optimization of superstructure can provide integrated efficien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n provide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mprovement of legal system, and culti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alents in marke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enabling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Finally, in terms of practical approa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such a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a healthy business environment,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building a modern innovation system, and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large market, so as to comple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macro-control to achieve the landing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nd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l-round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ified large marke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 彭建国)